

目 录

前言·····	杨定国 (1)
父亲的身教与言教·····	谢子谷 (1)
忆故诗文情慷慨·····	姜国仁 (11)
谢觉哉和贺耀组生前的三次重要交往·····	易凤葵 (19)
谢老查案一例·····	肖重周 (31)
怀念谢老·····	姜凤文 (37)
谢老与宁师·····	吴尚勇 (43)
回忆谢老的一次家庭会·····	吴岂凡 (45)
忆凌波·····	姜国仁 (50)
再忆凌波·····	姜国仁 (57)
回忆甘泗淇兄·····	姜凤文 (59)
周震麟传略·····	周德民 (64)
黄 钺传略·····	黄祖同 (73)
何梓林烈士·····	王兴刚 (85)
我省著名教育家诗人周世钊·····	周德民 (97)
忆宋品三·····	唐葆初 (103)
回忆农村工作团·····	
·····张旭临、刘美夫、张社球、戴至诚、刘琴林	(109)
煤炭坝煤矿发展史·····	矿志编写组 (118)
宁乡医药卫生简史·····	周石禅 (125)
宁乡宗教史料·····	陶述生 (131)

宁乡都团制度和保甲制度·····	孙凤歧 (141)
宁乡民船业的沿革情况·····	孙凤歧 (143)
宁乡南门桥·····	周德民 (146)
“四毒”有多大岁数·····	编 者 (149)
你知道吗——宁乡哪些人是黄埔军校学员·····	
·····	编 者 (150)
订正两则·····	编 者 (151)

父亲的身教与言教

谢 子 谷

韶光易逝，父亲逝世屈指已经十三个年头了！但父亲生前对我们兄弟、姐妹的身教、言教，记忆犹新。

我父亲是宁乡“四髯”之一的谢觉哉老先生。他老出身于清代晚期的封建地主家庭。自幼聪明，记忆超越常人。

1905年，年方19，以府首（全省第一名）考取秀才。按照他老的才智和我家当时的社会地位，起码可以当一名缙绅，扬名显亲于一乡；或者挤入旧官场，飞黄腾达，亦未尝没有可能。但他没有走这一条道路。当时，他老鉴于国事日非，民族危亡，迫于眉睫，便毅然放弃仕途，奔向革命。从此，叛逆秀才，背离孔孟，开始阅读进步书刊，探索救国救民之道。辛亥革命后，他老深感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仍不能挽救中国的危亡，便潜心钻研革命失败的道理，希望能找到一条更新社会的制度、拯民出水火的捷径。因此，于1913年，放弃优裕的家庭生活，去云山学校教书。在这里，父亲与革命的先驱者何叔衡、姜梦周、王凌波等同志共研国事，寻找革命的真理。及至马列主义传播到我国后，找到了革命的真理，便与一班老同志一同欣然走上革命的途径。

父亲在从事革命事业的同时，从不放松对我们兄弟姊妹的教育。他老教育我们的方法不只在口头上讲理论，而且能

在行动上给我们示范。即使在身历艰险或事务纷繁的时候，也是如此。记得在1919年的时候，我大姐琼英、大哥廉伯都刚从高小毕业，回到家里。父亲便教导我们说：“家里的封建财产是靠不住的了，大家要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要自食其力”。便分配大姐去学缝纫，大哥在家里学种田。鉴于我年纪小一点，身体也弱一些，便决定我中学毕业后去当小学教师。根据我家当时的经济条件和我大姐、大哥的学业成绩，升学是完全可能的。父亲为了教育我们在重视工农方面作出榜样，便毅然这样决定了。

大革命前，父亲每回到家里的时候，总是谆谆教导我们要与劳动人民打成一片。而他老自己呢？则从不以秀才、教师的身份出现在劳动人民的面前。我家有个老女工，名叫何三婆婆（四川人），是我祖母病时的侍候者，在我家工作多年。祖母死后，她还留在我家，父亲把她做姊妹看待。她双目失明，父亲非常关心她，老人死后，父亲在悼念她的诗句中有：“深惭报答只分毫”的感叹！他老一生平易近人，和住在我家附近茶亭子（专门为过客烧茶的地方）的谭藻华（他吃长斋，大家叫他“谭五斋公”）及农民周奇才、谭炳蔚、肖晓春等都成了好朋友。尤其是谭藻华老人，与我父亲往来更密切。后来，我父亲在回忆他的时候，曾写下“几回茶室谆谆语，要我将来莫做官”的诗句。一个斋公能对他老这样直道，也就可以想见他们感情的融洽了。父亲的这些行动，给我们作出了一个革命的知识分子应该怎样对待劳动穷苦人民的示范。

1927年后，父亲由于奔走革命，远离家乡，由中央苏区经过长征到达陕北。这一时期，一则关山远隔，再则国统区白色恐怖严重，我自己为了避免敌人的追捕，也时刻在

东躲西躲。因此，我与父亲的联系便很少了。在那艰险的岁月里，他老虽然偶或由地下人员寄来口信，也从不谈及个人的安危与生活的艰苦，只是谆谆教育我们好好劳动，好好改造自己的世界观，积极参加革命工作。

1949年全国解放后，父亲从到内务部工作时起，对我们兄弟姊妹的教育，更加周详了，要求也更加严格了。这时，父亲虽是年近古稀的人了，内务部的工作又是那么繁忙，可他老对我们的教育，却从没放松过。遇到重要问题，总是亲笔写信，作出详细、具体的指导。记得1949年秋，给我的第一封信是不要我到北京去看他。信中说：你现在全心全意做你的工作，（当时我在宁乡教书）不要来京。我还是老样，来看也这样，不来看也这样。他还担心我们以功臣的后代自居，产生骄傲情绪，又给我和大哥廉伯亲自写了两封很长的信。第一封是写给我的，其中谈到：——背的时候，人家对你的白眼，值不得记忆。革命是使全体人民翻身，不是哪几个人翻身的事。有些人不明了说了或做了对不起人的话或事，只要他本人不是反革命，也就算了。人的度量要大，眼光要远，切不要骄傲。不要使人有“现在是你们得势”之感——。第二封信是写给我和大哥廉伯的。内容主要是教育我们怎样指导孩子就业。其中谈到：——小孩子太本思了的，那就学种田或学做工的好。聪明跳皮些的，可以把几个入学。现在，革命大体成功，需要大批建设人才，各地都在开办大学。家中孩子谁宜于学什么，可以要他去学，但须先告诉我。不过家里总要有人作田和做工。将来租是难收了，家中没人劳动，外边又寻不回钱，你们又都老了，不免有困难。

革命打走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但是，国家给他们弄得

很穷了。我们在此做事的（若用过去眼光看是大官）只有饭吃。听说湖南农村也很穷。别的地方比湖南穷几倍。估计打仗打过后，不会再有自己家里打仗的事。咬紧牙关，再搞几年，元气就会恢复。1949年寒假期间，为了看望一别二十多年的父亲，并接受他老当面的教育，我与大哥廉伯一同去北京住了几天。在这段时间里，他老与我们兄弟谈话的内容，除询问别后家乡人民的疾苦情况外，就是教育我们兄弟好好为人民服务，好好接受贫下中农的教育，改造思想。凡事要服从当地政府的领导。此外，还教育我们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要为人民大众的利益着想。对我们应做的事都作出了具体的指导。连我们对小孩的命名都注意到了。我的两个小男孩是孪生兄弟，一个取名胜我，一个取名利他。父亲笑着对我说：“利他”可以，“胜我”还有点问题。（大概是没有站在革命的立场上对孩子提出要求。子谷注）当时宁乡还没有土改。他老在教育我们怎样对待土改，讲得也很周到。主要是要求我们彻底把封建财产还给劳动人民，彻底改造自己的人生观，做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其次，我还记得这次在京的时候，袁任远同志对我说过：你如愿意在北京工作，可以安插在内务部，反正这里还要人。后来，父亲知道了，便对我说：我不是做官，是在为人民做事。我坚决反对旧社会那种“一人得道，鸡犬皆仙”的搞法。你还是回去教你的书，绝不能以我的关系留京工作。你今后在工作中也要注意这一点。当任何领导，都不能任用私人。这对我后来在处理人事方面，是一番深刻、现实的教育。我担任宁乡六中校长期间，就没有任用过亲属。

土改时，父亲怕我们家里的人在实践中一时转不过弯子来，在思想上背包袱，在行动上不主动，便一再写信教育我

们。1950年春，在给我和大哥的信中说道：快土改了，你们身上会丢掉一个很大的烂包袱。从这个包袱带来的狭隘、偏私、锱珠必算、你争我夺的思想，不能不在你们兄弟间、关淑姊妹间以及一些老年人的脑子里打个粉碎。打成碎片了就得扫出。希望你们这次能扫个干净。从今以后，抬起头来，从新做新社会的人。担心廉伯的思想搞通要难一点，因一堆烂东西、还没有完全触动，（大哥是富农成分。子谷注）关淑记得是一个较能干的人，如果她的思想弄通了，以愉快的心情来撑持那个家庭，是能够弄好的。我讲的家是包括你，祖母、伯母、满姊及其他一大堆老弱残废。困难是有的，也是应该有的。由靠剥削生活到靠劳动生活哪能没有困难？但困难是可以克服的，由自己劳动来克服困难的过程，实际上是愉快的。问题在于要先弄清楚。接着土改完成，父亲从家里人的来信中，了解到土改后家里人的实际情况，认为有些做法不合他老的要求，便又写信给大哥和我及大姊琼英、满妹冰茹，内人关淑作出详细的指导。信中谈道：我乡土改，闻已完成。从去年到今年你们的来信中，你们从未提到如何生产，只是叫苦说困难，要我帮助。关淑跑到友仁（我当校长的学校·子谷注），不回家设法生产；琼英的女儿和媳妇也不在家生产；一些孩子不管聪明与否，读书没读书，全想出去依靠人，要正行（指我满弟谢放·子谷注）带去，原因是仍想过不劳而获的生活。看了你们的来信，虽然了解你们的情况，但看不到你们有志气、有计划地创造自己的前途，就要生气。早年我觉得穿绿长褂子不是出路，曾费了很多神，叫廉伯在家作田。当时廉伯是不愿意的。记得大革命时期，他参加农会后，来信对我说，已下定决心当农民了。但大革命失败到今，他虽然劳动了几十年，劳动观点尚不浓厚。证据就是不

能把做农业的孩子留在家里。早年我还费力要琼英、淑英学会缝纫，都学好了。除琼英残废不能做外，淑英竟也不动针线，从不劳动，因此竟成了神经病人。父亲的“只有人民，没有个人”、“只有国家，没有家庭的眷恋”的教育，在我思想上确实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父亲由于是教员出身，一贯重视教育。因为我是搞教育工作的，在这方面对我的教导也是很周详的。他老特别注意艰苦建校，重视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也很关心提高贫苦农民子弟的文化。1950年，我接掌友仁中学。当时，该校是一所私立中学，经费相当困难，甚至靠师生共同劳动，解决衣、食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提出要求当时的益阳地委补助我校一点经费。我曾把这一想法写信告诉我父亲，并请他老向益阳地委介绍一下实际情况。结果，得到的回答是：你有意把学校搞好，不在困难面前屈服是对的。但要我打电话给郭专员要他照顾就不对。公事公办，中央土改法规定，凡靠土地收入办的公私学校，人民政府要替它们筹办经费，但不能哪处多，哪处少。如说有情面，教育就会办不好。在如何照顾劳动人民子弟入学的问题上，父亲也作了具体的指导。1952年，他老在给我的信中说：中学助学金不多，应该发给贫苦的工农子弟。地主子弟他们目前的需要是从劳动中改造他们的阶级意识，达到作为新人，改变其成份，而不是急于认得几个字，失学对于他们并不是坏事。你们兄弟姊妹在这一问题上，还很模糊。年青的儿女，一个也不留在家里劳动，总是满天飞，碰了钉子，也不回头。放儿对此，也不明了，现在应该猛醒了。你的儿子，应下决心，把个把两个学种出。身体不好，通过劳动就会好的。望你继续努力，一切向前看，向进步看。并望你校同事都这样做。1956

年，我去北京的时候，他老当面指示我的办学方针说：友仁中学是一般中学，也是老粮仓地方的中学，几百个学生的绝大部份毕业后要参加农业生产。那末，就应教给他们以湖南及宁乡的地理、物产、耕田、作土、养猪、养鱼和蓄林的知识。使学校与农村联合起来，使学生毕业后，从事农业生产，不感到生疏。1957年他老回宁乡视察的时候对我说，我要亲自到你办的友仁中学去看看，看你把学校办得怎样。当时因老粮仓僻处山村，他老的警卫人员还怕安全有问题，请他老暂时不去。他老对我说：怕什么，我也是教员出身，你们学校教书的也是教员，他杀了我干什么？后来因时间问题，才没去友仁。但他老还是要我把全校师生带到云山。他老对全体师生在学习和生产方面，作了精辟的指示。那时，我深深感到，只要是做与人民有益的事情，我父亲对个人的安危是从不顾及的。因此，无形中给了我不畏艰险的现实教育。

父亲一贯重视农业和体力劳动。常对我们说：可惜我年纪老了，不能亲自参加体力劳动。平时总是一再教育我们要把几个子弟参加农业生产。1968年，我的小孩利他高中毕业后，回乡参加农业生产。他老听到这一消息，感到非常高兴。在给我的信中说：利他回家务农很好。我写信给他称之为“贤”。因为我家后辈，只有他一个听话。不知你们为什么不赞成？这不是爱护后辈的方法！那时候，搞农业是要艰苦一点。从这里说明我父亲教育我们的是：作为一个革命者，越是艰苦的工作，就越要带头参加。

其他，在坚持实事求是、讲究节约、爱护森林几个方面，父亲对我的教育也是很深刻的。父亲不讲究穿吃，经常穿着布衣布鞋。后来当了高级干部，也是如此朴素。他老

“插菜打清汤”的诗句是著于名的。记得1959年正月，他老再次回宁乡视察的时候，当时的县、乡政府为了迎接他老的归来，搞了点设备和招待。他老不但不以功高年老、应该受到欢迎的态度出现，而是非常不满意。1960年在给我和大哥麻伯的信中说道：去年正月，我到宁乡看了许多好东西，是值得称赞的。但有的看不顺眼。为什么只在南香冲站了两个钟头就跑了？因为逼得我不能不跑。连夜由谭家湾修了一条到我屋门口的汽车路，这是为什么；而堆子山的木桥没有了不修，（听说细屋咀的木桥也没有了）却赶修了一条走汽车的桥——涨水就要被冲去。屋子里站几个穿白衣的招待员，不知道是在哪里学来的。院子里人站得不少，但没一个是左邻右舍的。幼儿园的几个幼儿，从西湖冲赶来，那几个幼儿是长得好的，但来不及看了，只好走。到流沙河主要是去看鱼，因为有人吹得厉害。后来我对张县长说：“乘舟归去看蔬鱼”，要看的不是这样的鱼，这是摆样的鱼，应付参观者的。在县里吃过饭，跑到老粮仓不过两小时，你们要我吃饭，我不肯吃。关淑说，都是儿子，为什么不吃？我当时没回答。心想：如果在你的家里，关淑做几样小菜——煎豆腐、插菜汤之类招待我们几个人，我一定高兴吃。可惜不是这样！在六中吃饭有四桌人，我问为何有这么多人，说都是随我来的。到流沙河公社又是设了丰盛的饭菜。听说五里堆公社也为我准备了饭。好象谢胡子是个冒底洞，可以吃过不停。到宁乡县你们又都来了，又是几桌。在这情况下，我实在站不住，只好急走。我是四十多岁才离开了乡村，乡里的印象留得很深。现已年老事少，到故乡住几天，随便看看谈谈，于人于己，可能有点益处。但必须给我自由，不要这么多人围了我。允许我自己到食堂买

菜好了。我不能同劳动，但同吃、同住总可以。这回我不怪县、社的人，也不怪你们，只怪我事先没有严格地说清楚。从父亲的这些言行里，我深刻体会到：他老以不居功骄傲、实事求是、讲究节约、反对铺张浪费的实际行动教育了我们。至于爱护森林，好栽树，这是我父亲一贯的作风。他老不但自己这样做，还经常教育我们也这样做。大革命前，他老无论是住在家里或在云山教书，每年总要在荒地或屋旁、路边栽种一些树木或花草，美化环境。对已蓄好的森林，总是不许家里人乱砍滥伐。1962年，我内人和侄子在屋后山里砍了几株古树作零用，受到了公社的责难。消息传到北京，我父亲听了感到非常气愤。除责令他们砍一株要栽一百株作补偿并向公社、大队作检讨外，还写信给家里进行了严肃的教育。在给金国的信中说：你婶婶和文义砍伐树木是很大的错误。公社对你们的处罚完全是正确的。不久前，我在回复沙田大队的信中说，要你们在社员代表大会和社员大会上作深刻检讨，而且不只一次，要直到大家不要你们检讨了为止。其次，你们还应向前人作检讨。想想水德塘、乐家仑、肖家湾直到南香冲过去的树林，你们的前辈是如何爱护树林的。而你们却在破坏树林。你们还要向后人作检讨。

‘前人栽树，后人遮荫’，你们的儿子、孙子连遮荫的地方都没有了，他们会埋怨你们做父亲、母亲、祖父、祖母的。我年纪老了，身体衰了，也打算不再回家了。你们也不要来，除非你们变成了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分子，变成了护林、育林的先进分子。到那时，你们再来也就无愧了。父亲的这种爱护森林、爱好栽树的作风，对我养成爱好花木、爱好栽树的习惯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的。

父亲生前对我们兄弟姊妹的教育，可说是竭尽心思，做

到了无微不至。在身教方面，他老以身许国，不顾个人安危，凡事为人民的利益着想。国而忘家、公而忘私的作风，给我们后辈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在言教方面周详具体，理论与实际相结合，遇事以革命的真理指明我们应走的途径。我觉得这也是对我们怎样教育儿女作出了榜样。

父亲生前对我们进行教育的一言一行，今日思之，在我兄弟及我们的后代的持身行事上，影响是很大的。以是我们一家，所有在各条战线上工作的成员，都能持身谨慎，勤勤恳恳地为党的事业努力工作，即使在艰险动荡的岁月里，也经得起党的考验，幸无陨越，足以告慰我父在天之灵！

今天正是我们的祖国欣欣向荣的时候，也是我父亲百岁冥诞之期。考虑到父亲生前教育我们的言行，对教育当前青年一代，不无裨益，因就记忆所及，结合当前实际，录其主要者供教育儿女者参考，并以此自励。

编者按：谷老此文既是对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也是广大家长和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教育子女的好题材。因此，尽管其中部分内容已在其他书刊上发表过，我们考虑到在当前仍有着非常深刻的现实意义，故予以全文刊登。

忆故诗文情慷慨

姜 国 仁

我在五四运动以前，就认识了谢老（觉哉）。他和何叔衡、姜梦周、王凌波等同志是同乡、同学，最相友善。一道在宁乡和长沙从事过教育和革命工作。当时，我在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读书，很敬佩他们的品德和学问，常到他们工作的地方和寓所求教。他们霁然可亲，待人最是诚恳，把我当学生和朋友，因而建立了亲密的关系。但我向谢老学写诗，彼此唱和，却是我一九四〇年随王凌波同志到延安以后，才开始的。

一九四一年九月，林老（伯渠）和谢老联名宴请延安的老年诗人，发起成立“怀安诗社”，由李木庵同志主持。诗社成立后，老人们诗兴盎然，吟诗啦，填词啦，盛极一时。谢老是前清秀才，后来是一个坚定的革命家。他受过八股文、试贴诗那样死板的公式化的磨炼和束缚，但他一从封建的桎梏中挣脱出来，就以宽阔的胸怀，卓越的器识，豪华的才气和炽热的情感，写诗作文，歌颂光明进步，抨击黑暗腐朽，这是一般人所难及的。

我钦佩他学识渊博，很爱读他写的东西。他的诗文有时象瀑布，有时象清泉，有时大笔浓墨，有时细刻精雕，真可谓笔底生花，斑斓多彩。近年我翻检旧篋，发现尚保存了谢

老的遗墨：有书信、有诗词，大都未发表过。时隔多年，重读起来，它还象过去那样亲切，那样富有深刻的教育意义。现辑录部份，以表达我对谢老的怀念。

在延安，谢老为了鼓励我过艰苦的生产，曾书写过一首七绝给我。这首诗写他长征到陕北吴起镇和徐老等夜宿麦地的情景：

露天麦地覆棉裘， 铁杖为桩系马缰。
稳睡恰如春夜暖， “天明始觉满身霜”。

谢老给我解释说：“长征时我因年老体弱，到遵义后，又患疟疾，腿脚都浮肿了，过草地断了粮，吃草根树皮，常在寒风刺骨的夜晚和徐老共盖一床军毯，露宿在野外，往往半夜冻醒。一路上，真是经受了千辛万苦。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份，我们到了陕北吴起镇，打了一个大胜仗，长征胜利了。虽然仍是严寒的夜晚，露宿野郊，但心里踏实，热乎乎的，睡的又甜又香。”

我很喜欢这首诗。“稳睡恰如春夜暖”，十分耐人寻味。我觉得谢老是在用形象的语言，阐发革命道理。党和红军深受“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之害，失掉了中央根据地，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面对百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常一夕数惊，连安稳地睡一觉都不可得。只有正确路线指引下，长征取得胜利，重建了革命根据地，才能睡觉也安心。“天明始觉满身霜”，活用了清人郑板桥《行路难》诗中的原句，又贴切，又新颖。全诗寥寥二十八字，却格调高昂，意境深远，失败中寓胜利，胜利中见艰苦，洋溢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没有一点颓唐气馁的情绪。非亲身经历过来的，是写不出这样好的诗的。

一九四二年，王凌波同志在延安行政学院副院长的任上，

因工作过度劳累遽尔病逝，使我无比悲恸。这时谢老的刺激也很大，因为“宁乡四髯”至此健在的只有他了。他们生前有约，后死者应为先死者作传。为了表达怀念之情，也为了让后一代学习先烈的崇高精神，他终于给叔衡、梦周和凌波都写了传，并作了一首《感旧》的诗。

梦周蹇蹇人中圣，	亲者遭屠奸者庆；
坟荒草陈血尚新，	三楚遗黎长饮恸。
叔衡才调质且华，	独辟谿径无纤瑕；
临危一剑不返顾，	衣冠何日葬梅花？
凌波豪迈复缜栗，	寒不变兮威不屈；
健魄不禁急病催，	挚友良才倏焉失。
三君次第委红尘，	远十四载近一春；
总角论交惟剩我，	衰年感旧更何人！
往事历历不可说，	遗我碧磷和黑铁；
金鸡一鸣天欲晓，	宝剑长埋地犹热。
革命道途险不爽，	革命志士白头稀；
前仆一兮后起百，	伫看旷宇生光辉。

这首诗用铺排的手法，把三位故友不同的性格特征写出来了。梦周勤勤恳恳，最能吃苦；叔衡质朴，而又内藏才华；凌波豪放，办事却很缜密。他们都是人中的圣者，难得的良才。他们遭了杀戮和病逝，是革命的巨大损失。虽然奸邪的人弹冠相庆，但三湘的人民都在长久地痛念他们。作为少年时代开始相交的真挚朋友，又怎能抑止住心中的悲愤呢？特别是叔衡的忠骨尚未收殓，那一天才能象安埋史可法一样地把叔衡的衣冠也葬在梅花岭上呢？这是多么纯厚忠诚的同志爱、兄弟情！我每次读着这些诗句，都感动得泪流竟日。

凌波去世后，谢老在凌波同志的女儿警吾处，看到我和凌波唱和的诗，感慨系之，就用这个韵，做了两首悼凌波的诗，并写了小序：

凌波同志从不为诗，近始知其自出狱后，和国仁同志唱酬篇盈百，稿废漏中；来延安后未见其一提也，偶于自邕寄警吾信中见数首。呜乎，倚新篁兮双井，玄亭问字之年；踏初雪兮小桥，元白登台之日。聚也散也，时紫云树之恩；行乎居乎，尝遍斗争之味。自谓壮夫，不为小技；泊乎晚节，始倚新声。然而歌郢中之白雪，自赏孤芳；望江上青峰，遽成绝响。月色照于屋梁，疑魂返魂来之候。诗筒寄诸泉路，拟大招小招之篇。痛与韵俱，泪随声堕。

小金陀馆集群仙，	白帽青衫最少年。
谊是难兄与难弟，	分无王后抑卢前。
读书中夜刘琨舞，	揽轡长途范滂贤。
四十二年交谊重，	人如可赎岂论钱！

海仇山恨累年年，	誓作人豪不作仙。
学得屠龙才待用，	愤于履虎气无前，
横流共击祖生楫，	避难曾分鲍叔钱。
我已鬓衰君又死，	天涯垂泪哭乡贤！

我试将这两诗意译如下：

在“小金陀馆”的私塾里，聚集着一群风华正茂的青年。穿戴白帽青衫的年轻人中间，数你最显得英俊年少。论交谊，我们真象元方、季方兄弟一样；比才情，彼此又认为不必象杨炯那样争论谁后谁先。挑灯夜读，学刘琨闻鸡起舞；以天下为己任，好榜样就是范滂那样的先贤。四十二年的友情啊，多么深厚！如果能赎回你宝贵的生命，谁也不会去吝

惜什么金钱。

为着洗雪这百年的国仇家恨，我们都发誓要做人间的豪杰，而不做什么看破红尘的神仙。我们学得了搏击蛟龙的高超艺技，正等待时机，大显身手；驱除虎豹，一往无前，这是我们早就养成的豪迈气概。匡时救国，我们愿效祖逖到中流击楫。仓皇避难，我却象管仲一样使用过鲍叔你的金钱。而今壮志未酬，你竟溘然病逝，我也两鬓如霜，还远离故土，真是抱恨无涯，禁不止临风洒泪，来痛悼。你啊我们同乡中的英贤！

一九四四年，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已侵入中国腹地，我们家乡湖南宁乡的乡村也沦陷了。消息传来，谢老满腔义愤，以《闻日寇窜宁乡》为题，填了一阕《满江红》寄我。第一是：众老乡亲，两眉深锁；雏孙想象阿公容，大儿恐亦二毛可。更开门七字柴米盐，不易举。多少人，冻与饿，又遭上大兵火，看大沔岭东，回龙铺左，豪吏缚人如缚鸡，将军避敌如避虎。老乡们，挽着老和幼，何处躲？

过了一晚，谢老觉得前一阕词只讲到家乡人民受苦受难的一面，没有写出湖南人民的英雄气概和斗争传统，于是仍用前调，再填了一阕：

中国若亡，“除非湖南人尽死！”（似是唐才常说过：“若要中国亡，除非湖南人尽死！”）从明末直到而今，英雄几许！百万农军北伐时，十三雄镇南明史，岂是那十年奴化，能抑止？湖南官，胆如鼠；湖南民，气胜虎。要涤腐生新，锄凶雪耻。又建湖湘根据地，人尽为兵，政民主，让国民党闹成大亏空，我们补！

一九四六年春，谢老生日，我写了一封贺寿诗，内有“明年寿席归乡里”之句，是希望战争胜利后回家乡给他做